

思想素质

● 保持自我，选择更新

李光耀曾经指出：“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 50 到 70 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虽然改变在所难免，我们还是必须设法保留我们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可以看到，随着新加坡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展开，尽管新加坡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较之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努力保留自身特有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价值

观念，保持对外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作出有选择的、创造性的吸收、改造和更新的清醒态度，在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文明程度的同时，也努力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成果，无疑构成了新加坡国民思想素质中一个颇有特色的方面。

和祖先的历史认同

1965年新加坡独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当时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是移民，他们来自印尼、印度和中国等地。时光荏苒，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新加坡本土生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了今天新加坡人口的主流。但是，对于先辈们在移民过程中所继承下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新加坡人仍然有着一份浓浓的情感和依恋，“和祖先的历史认同”的倾向和归属意识，构成了新加坡人思想素质中一种独特的基本特色。

早在 70 年代末期，新加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就已经有了足以自豪的成就。建国 20 年来 8% 以上的经济年增长率、政治的长期稳定以及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使新加坡达到了“庶之富之”，开始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急剧的城市化、工业化所造就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在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冲击，那些在过去曾经支撑和引导新加坡人民的传统道德、义务和社会方面的思想、规范和价值观念等，也开始受到挑战。但尽管如此，新加坡人从来

也没有抛弃自己祖先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反，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之传统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创造性地转化出来，从而获得了与时代前进的节奏协调一致的生命活力。

新加坡人像其他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居民一样，不但富有探索和冒险精神，能够吃苦耐劳，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具有极强的适应和生存能力等，而且也能够“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万国语，容纳各宗教”，形成了一种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色彩斑斓、协调相处的和谐景象。但与上述移民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虽然是由众多国家、不同种族的移民如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欧洲人所组成，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却是华裔。因此，如果我们从数量的角度出发，只要考察一下新加坡的华人在“与祖先的历史认同”方面所展开的具体活动，就可以从中把握到新加坡人在此方面的整体状况。具体来讲，新加坡华人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认同祖先历史的努力，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敬拜祖先。在新加坡，一般的华人家庭大都将自家祖先的牌位安放在会馆里，这与过去中国大陆的普通百姓将神主牌位安放在祠堂中一样。会馆中安放神主牌位的厅堂往往布置得非常华丽，悬挂着同姓先祖的功名匾额等。其中神主牌位的排列不是依据其辈分高低，而是视其家属缴纳的金额多寡而定。在新加坡的会馆中，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大典，祭拜仪式由会馆的主事人员担任，而在祭拜大典中宗亲会又尤其强调了要保留祭

祖的观念和仪式。由于新加坡的宗亲会通常是由同姓的宗亲所组成，而不只是某一族系单独所有，因此祭祖仪式常常会上溯至年代久远的祖先，如此一来也就将背景来源各自不同的同宗族人都涵盖了进来。由于一年两次的春祭和秋祭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所有的会员都要参加，在典礼之后还有会员聚餐，而这种聚餐无疑极大地增加了族人的接触机会，培养了他们的团体意识和历史认同感。英国人类学家傅利曼教授在 1949—1950 年间完成的对新加坡华人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调查中，曾经摘录了某宗亲会之纪念特刊中的这样一段资料，可以说是很详细地阐发了新加坡华人成立会馆和敬拜祖先之礼仪的宗旨：

宗族繁滋，当有其根本渊源之所在；而精诚团结，不隔乎方隅支派之分歧。故定一本为万殊所归，藉众擎而大事斯举。惟我 × 氏自 × 公受姓以来，源远流长，支蕃派衍，其同宗之遍布国内各行省者，又蔚为大姓；而散居海外者，数亦甚繁。若能集其全力，以作有系统之合综，其势当不可侮。以之举措百事，殆无不济。顾数十年来，一任其精神涣散，各地虽不乏一支一系之小组织，而分部别居，莫相统属；虽有潜在之势力，而不能为宏伟之谟猷，职是故也。尤有甚者，族人既涉居于东南西北，传统愈远而愈忘其族焉，吉不贺，凶不吊，视亲人若路人，诚憾事耳。同人有鉴于此，爰有“南洋 × 氏宗亲会”之筹设，用以号

召各地之同宗，团结一致，慎终追远，根本追源，同时祭祀远近祖先，并因此而敦宗睦邻，养生送死，庆吉吊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既拓进于海外，更进而建设其故乡。

从这一段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加坡华人组建宗亲会馆时，其基本的指导思想乃在于慎终追远，敬拜祖先，由此达到促进同宗同姓之间的和谐相处，团结一致，而以之举措百事，则有群策群力、势不可挡的力量。这种遍布于新加坡的宗亲会馆以及其他的同乡会馆，均由当地既有财势又有很高声望的人出面主持。而通过敬拜祖先这一仪式中的一系列活动，不仅增强了同宗同族人之间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而且也很好地维系和延续了家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客观上起到了影响人们在情感上回归祖先、认同祖先的作用。

——纪念传统节日。节日是在某一社会或人群之历史延续的过程中所凝固和传承下来的。在现代社会中，通过节日期间举行的各式各样的庆典活动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不仅可以让人们暂时从精神上摆脱激烈的竞争和快速的生活节奏带来的压力和紧张，而且也可以让人们回归到祖先之历史文化传统的氛围之中，获取一份认同祖先的历史归属感。如今的新加坡，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充溢于社会生活中的激烈竞争和明快的生活节奏，加之外来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人们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花费很多时间来庆祝一个传统的节日。但是，今天的新加坡人也从来没有轻易地放弃自己

的传统节日，相反，节日期间的庆典活动仍然是非常隆重的。渴望欢度节日和举行迎神活动，把节日庆典当做欢天喜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在新加坡人尤其是新加坡华人的社会中恐怕是最为强烈的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颜清湟博士所指出的，“新马华人社会如果没有华人的节日，也许会显得非常不同。遵奉中国的节日庆典，对于保持华人社会的‘中国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大多数华人节日都遵守最初的形式，尽管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不同，但海外华人仍严格遵行阴历”。

新加坡华人非常重视的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这些节日在新加坡历经数年的变迁，虽然在庆祝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已经脱出了其原来的窠臼，但经过新加坡华人的创造性的转化，又为之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和生命活力。比如，新加坡的宗乡会馆为了让节日活动能够与新加坡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步骤相协调，就在节日的庆典活动项目上做了不少的简化、修饰和充实的工作，而 1993 年宗乡会馆和其他团体联合举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的活动，就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转化的成功之处。在庆典的这一天中，会馆组织了全新加坡的各族人民聚集到新加坡河畔欢度春节，这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春节的气氛，沉浸到与传统习俗相认同的情感之中，而且在歌舞表演的喜庆活动中，也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洽关系和凝聚力。这就使得人们不仅获得了一次与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相接近和认同的机会，而且在无形之中也对新加坡社会之秩序维持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关于这一

点，李光耀于 1991 年 2 月在新加坡宗乡总会中华总商会主办的“向李光耀致敬新春晚宴”活动的演讲中，就曾经作出了相当高度的评价：“这些盛大的庆典能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些庆典节日使我们回忆过去，使我们和祖先的历史认同。我们的历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它早在 5000 多年中国文明创始时就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传统和文化。”

保持对东西方文化的清醒感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由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定居下来，生存繁衍，他们各自遵从自己以前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和谐相处，形成了今日新加坡独特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又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成功转型过程。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并存和社会急剧变迁转型的背景中，新加坡人始终保持了一种在对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之不同文化类型的选择和接受上的清醒态度。

在新加坡人看来，小国寡民，资源稀缺，是他们所面临的客观限制条件和严峻的生存挑战，而要超越上述限制和迎接挑战，就不能固守和依赖东方文化传统的形式，而必须向西方学习，使自己能够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新加坡人也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以实现本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同时，又要

对随着先进的物质文明成果而来的外来文化保持清醒的态度，努力保持新加坡既有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从而使自己不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方向。

在建国以来的 30 多年时间中，通过向西方学习和开放，为新加坡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经济繁荣和物质文明成果。此一阶段中，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百倍，到 1996 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1194.87 亿新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34459 新元，实际国内经济增长率达到 8.9%。但是，由于经济和技术发展本身所带来的直接变化和由于使用了外来的技术文明而带来的文化上的变化在本质上是两回事，技术引进在带来了新加坡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文化的引入。而西方文化和相应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则是迅速造成了新加坡的“文化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不良的影响，如追求西方的高消费生活方式、赞赏西方的电视广告、津津乐道甚至崇拜好莱坞的明星乃至文化模式、嫖娼、欣赏黄色电影、私设赌场、吸食毒品等，而更为根本的则在于它导致了年轻一代盲目沉浸在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的影响和覆盖之下，从而最终有可能忘掉自身的文化传统。

这些现象的出现，自然引起了新加坡人，尤其是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忧虑，其中，像李光耀、黄金辉、吴庆瑞等这样一些资深的政府首脑，对于西方文化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及其在新加坡社会中引起的反应，始终保持了一种清醒的态度和认识。李光耀曾经指出：“在接受西方科学、工艺和工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

能完全排除现代西方世界的不良风气。这种风气像雪片一样飘落在新加坡人的身上。”前任总统黄金辉在其施政演说中也曾经不无忧虑地讲道：“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价值观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前任副总理吴庆瑞也曾经指出：“不能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翻版，要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西方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如果我们依样画葫芦，我们也是会学坏的，这对我们经济的活力，经济的发展必将构成极大的破坏。”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新加坡人“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继承和保持东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以抵消西方文化中的腐朽部分”。在他们看来，对于西方文化中的有效成份如科技意识、效率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和竞争意识等，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竭力仿效。但是，对于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和伦理道德沦丧等腐朽的因素，则要坚决地予以摒弃。在这些领袖人物的影响之下，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行了富有东方文化特色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

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对外来的西方文化采取选择性的扬弃而非全盘照搬的同时，对于本土既存的东方文化同样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使东方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能够被改造成具有一种符合现代新加坡所需要的表现形式。新加坡人诚恳而恭敬地师法东方文

化中所包含的孝顺、忠诚、谦虚、诚实、仁爱、守信、勤劳、节俭、稳固家庭、协调和睦、注重道德情操以及强调国家社稷为重等弥足珍贵的有益成份，并使之普遍推广而深深地扎根于市民社会的土壤之中。而对于东方文化中所包含的裙带作风、权重于法、人治胜于法治、家长制、关系网、贪污腐化、缺乏效率等糟粕因素，又在社会生活中予以坚决的拒绝和摒弃。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新加坡社会中开展了一场关于“国家意识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经由国会批准，新加坡政府于1990年2月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提炼和阐明了五大共同价值观（这五大价值观为：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关怀扶助，尊重个人；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在白皮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制定白皮书，目的就在于要对“西方影响的巨大压力”作出新加坡人自己的反应。从表面上看，白皮书中所提炼的五大价值观的表述与中国的儒家文化非常相似，但在本质上它却绝不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经过了一番创造性的改造和发展，使之与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种族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并以其现代性的精神气质和其他种族的伦理观念相协调，从而在抵制西方文化中不良因素的影响的基础上，在全民中树立起一种“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五大价值观的确立和推广，清楚地展现了新加坡人民“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中不要失去自我”的清醒认识。

物质与精神并重

新加坡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小小岛国，它除了拥有“阳光和空气”以外，其他一些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包括淡水、粮食、蔬菜、水果、石油乃至填海造地所用的土石等都完全要依靠进口。但时至今日，经过新加坡人民 30 多年的艰苦奋斗，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 1996 年，在物质文明的建设方面，新加坡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和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86.29 亿新元；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34459 新元；

国际贸易总值达到 3438 亿新元；

国家外汇储备达到 973.4 亿新元；

失业率由 1960 年的 14% 下降到 2.7%；

人均寿命由 59 岁提高到 76.5 岁，仅次于日本而居世界第二。

与此同时，新加坡还保持着其他一些令人称美的世界纪录，如：世界第三大港口，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世界第五大外汇市场，世界第一流的机构、公路、通信、电力供应；连续几年被评为“国际竞争力排行榜”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到 1996 年时，新加坡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的行列。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和物质技术水平，表现出了新加坡人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艰辛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当人们置身于新加坡这一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之中时，却很难看到类似于西方社会中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产生的一些消极、颓废和腐朽的社会病态现象，取而代之的是良好的道德风貌、社会秩序和优美的生活环境。凡到过新加坡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政府机关中一丝不苟、严守纪律的公务员，还是惠普公司中那些对自己的岗位充满职业自信感的年轻“白领”职员；无论是那些穿着干净漂亮的学生服在繁华的柔佛士广场或是豪华的威斯汀·斯坦福饭店前为癌症患者募集慈善救济款的小学生，还是在小贩中心殷勤热情地接待客人进餐的男女招待生，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忠于职守、恪守职业道德的敬业精神，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对未来的乐观信心以及助人为乐的仁爱之心，都会不知不觉地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震动和感染。这种敬业精神、自豪感、责任感、仁义之心等，表现了新加坡人对于一种文明、高尚、进取、务实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和认同，展示了新加坡人良好的道德和思想素质。它从精神文明这一层面上确证了新加坡迈向现代化过程的巨大成功。

短短 30 年的时间，在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跨度上无疑是相当短暂的一瞬，但就是这“短暂的一瞬”，却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激发了亮丽的火花，并铸就出了东亚小龙那“飞龙在天”的勃发英姿。人们不禁要问：新加坡何以能够如此？

关于这个问题，新加坡的一家华文报纸写得好：“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必须兼顾精神和物质的需求，

两者不可分。只重视精神文明而忽略物质文明，社会和国家必穷，民穷则社会不安，社会不安则国家危矣。只重视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社会或国家必腐，因为人的物欲是无穷的，必将走上自我享受之路，社会越来越奢侈化，道德必然因之而堕落，社会国家危矣。最好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兼顾。”事实证明，这样一种从政府理念到普通市民的思想中都自觉地兼顾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的同步发展，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新加坡人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以及其今日之较高的精神文明素质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艰难的塑造过程。在建国以来 30 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经济的起飞和社会的转型，建立在其经济和技术之强势的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不断涌入新加坡，对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行为乃至价值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和人民从家庭、学校、国家和社会等各个不同的领域或层面上开展了颇具特色和卓有成效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在家庭生活领域中，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维系家庭的稳固，并对之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也是新加坡的基本国策。在新加坡人看来，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削弱家庭的作用，就破坏了社会的根基；而维系家庭关系的稳固，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因此，新加坡的许多政策，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对维系家庭关系和睦、稳固的明显倾斜，如政府颁布的组

屋政策中就规定，凡是三代同堂的家庭以及父母与已婚并组成单独家庭的子女居住得相近的，在购房时享有优先权。可以说，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已经构成了新加坡社会中的一种基本信条。乐龄人士（新加坡对年长者的亲切称呼）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能得到全社会的悉心关怀和照顾。而在人民协会及其基层组织民众联络所和居民委员会所组织的重大活动中，就有一项是广泛地组织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有益于乐龄人士身心健康的文化休憩活动，受到了老人们的热烈欢迎。

在中小学校所开展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新加坡政府最初采取的做法是，先在学校里加强道德教育，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后来很快发现这种灌输没有多大成效，因为一来这些课程的教材单调乏味，二来道德教育课只上课不考试，引不起学校和学生的重视。经过政府和有关专家及宗教界的知名人物的商议，把教育课改成了宗教课，并同时开设了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课程。在此过程中又发生了某些宗教团体利用宗教教育企图改变人们宗教信仰的事端。政府便果断地停止了这种宗教教育，重新恢复东方文化传统和儒家伦理的思想道德教育。

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新加坡政府和人民也非常注重精神文明建设，而把思想道德教育和东方文化传统价值观的推广同经济建设磨合起来，使之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同步前进，形成了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新加坡人可谓是指思想明确，

工作细致，办法巧妙。多年以来，由新加坡政府推行的各种各样的以厉行节约、清洁卫生、交通安全、文明礼貌等为主题的群众活动，几乎是逐年逐月从不间断。比如在厉行节约方面，新加坡作为一个富国，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1.5 万美元左右，但崇尚节俭、严禁浪费的社会风尚却遍及社会和个人。不少政府部门都没有专门建立自己的大楼和车队，其办公所用的房子是租的，甚至接待重要客人的车辆也是从出租汽车公司租来的。他们赠送客人的礼品，大都不是购自商店，而是本单位的某些用做广告宣传的纪念品。甚至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用水，新加坡人也是杜绝浪费，涓滴不弃。这样一些活动虽然一开始是由政府出面进行提倡和组织，但历经多年，已成为新加坡人的一种自觉行为方式，它以示范诱导而非强加于人的形式，广泛地深入到了新加坡社会的各个层面之中。当然，新加坡这种教育性质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也不是万能的，对于那些违反社会利益的不良行为，政府也规定了许多严厉的惩罚措施，“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法规制定得最清楚、强令实施公共道德最严厉的国家”。教育领先，惩戒其后，两者相互兼顾，维系了新加坡社会的良好秩序和道德面貌。

当然，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境况，加上新加坡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东西方文明及其相应价值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也为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带来了一些困难和障碍。尽管新加坡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协调、同步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加坡人民在精神道德面

貌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流也的确让人感到欢欣鼓舞。但不少新加坡人仍然对其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和未来怀有一种担心和不安，如爱国主义还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根、年轻人埋怨参军太苦、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愿意参加公益活动，甚至对政府的严格管理不以为然等等。在我们看来，这些现象的出现虽然对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构成了一种挑战，但新加坡人民对此所表现出来的深切关注和担忧，却正好说明了其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所收到的成效。

● 开放社会，健全人生

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新加坡的一项基本国策。李光耀曾经谈道：“新加坡的经济是自由开放的。对外贸易是我们的经济命脉。……自由公平的贸易以及不受约束的投资政策，使像新加坡这样缺乏天然资源的国家的经济，比像阿根廷和巴西那样内向但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加出色。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推行这些政策。”自从新加坡建国以来到现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造就了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同时，在此过程中也为新加坡人民塑造出了一种努力在开放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结构安排和社会发展模式，新加坡人立足于自己所处的亚洲社会的实际情况，依靠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努力，开拓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健康的人生走向。

开放中的生存与发展

新加坡是一个微型的海岛国家，国土狭小，人口不多，自然资源相当缺乏。如此小国寡民的特征使新加坡人始终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危机感。正因为如此，新加坡人民从建国之初到繁荣之后，都始终把生存 (Survival)、安全 (Security)、成功 (Success) 扎根在自己的思想中，并把这样一种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凝聚成指导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基本观念。而如何超越资源缺乏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并从根本上摆脱小国寡民的危机感呢？对外开放无疑就成了新加坡人惟一而现实的选择。

在实施高度的、全方位开放的过程中，新加坡采取的是三个方面的“拿来主义”：拿来资金、拿来技术、拿来人才。这种拿来主义的政策导向在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弥补了新加坡经济建设中的资金不足，开辟了新的就业领域，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改进了自身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提高了其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改善了工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并最终建立了新加坡整个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即制造加工业、金融服务业、商业贸易、运输与通信业。

在制造业方面，新加坡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开发了自己附近的岛屿，发展起以电子产品、石油加工、船舶修理等为主的加工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和电脑磁盘驱动器的主要生产国。在其整个制造业的 489 亿固定资产投资中，74% 为引进外国资金，其中，